

一

我庆幸自己生在新中国，童年唱过的歌也那么晴朗，没有一丝皱纹。还记得上学后，我读的最初的课文，看图识字学的是：五星红旗、天安门、毛主席、工人、农民……在老师的讲解中，我知道了祖国、人民领袖，还知道了劳动是光荣的。

接着认识了飞机、火车、轮船、汽车、拖拉机……我生在一个小镇，课本里能飞能跑的这些“机器”我都没见过，但“它们”让我懂得了要爱科学，而且心中有了远方。

这课本简单吗？多年后回想，我们齐声朗读，稚嫩的声音冲出教室，那童声中已有我们共同的价值观。

我的小学有一个篮球场，篮板上有个铁圈，直到小学毕业，我也不知道那铁圈下是应该有个网的。我的小学是不是很差？但多年后我知道，我已经在我的小学里接受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这最好的标志是，我进了小学，老师就教导我们要爱祖国、爱人民，不要损人利己，要助人为乐，要有远大理想，长大了用自己的双手去改变祖国的贫穷面貌……我们开始学雷锋，懂得即使是在打赤脚、穿补丁衣的日子里，也可以通过帮助他人得到快乐。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的灵魂里得到了一种东西，懂得了，人生在世，应该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活着。

这就是新中国给予我的最重要的东西，它可以使我渺小的人生不那么狭隘，可以使渺小的生命体会到人间的高山流水、海阔天空。这不是头脑里装进了多少知识，这是灵魂沐浴着阳光。

那个年代，有线广播把数不清的穷乡僻壤连成了紧密的中华大家庭。“要知天下事，天天听广播。”我童年的小镇，广播也走进了千家万户。那时，全国的学校、机关、工厂每天上午10点钟都集中做广播体操。我们全校师生也都到大操场上，大喇叭里响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领操声，全国亿万人在天南地北在同一时间，挥动双手整齐划一地做播音体操……想象一下，那是怎样的齐心协力行动一致的祖国。

我的阅读兴趣是在小学里培养起来的。三年级时，老师在班上开“故事会”，让每个同学都要讲故事，还要评比。这促使我们要去看课外书。我在那时喜欢上了看课外书（起初是小人书）。课外阅读多么有效地延伸了我了解历史、认识世界的眼睛。

我读完初一遇到了“上山下乡”。我庆幸自己去插队之前已经读了《三



□ 王宏甲

我庆幸自己生在新中国

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杨家将》，还读了《青春之歌》《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毛泽东选集》（部分篇章），还读了《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古丽雅的道路》《我的童年》《在人间》，等等。

我在乡村夜晚的茅屋里静静地回想，如果我没读过那些作品，我踩着乡村的泥泞，置身绵绵阴雨，那就是在泥泞和阴雨里……但是现在，作品中那遥远的青年男女的人生，或者爱情故事，那么奇妙地让我对乡村的茅屋、树林、金黄的落叶以及河边的草地与波光粼粼的湖面，都有了亲切的感觉。当然不是没有困难，但心中似乎有一种克服困难的“东西”。

渐渐地我知道了，重要的不是我记住了多少故事，而是我所接受的教育（包括我读过的那个时代倡导的书籍），让我懂得了祖国、人类、正义、善良、毅力、顽强，还有什么才是真正的青春、爱情……所有这些，都比知识更重要！

我至今认为，人生至少在15岁的时候，生命中该生长出属于品质的东西，譬如情怀、良知、志向和信仰，这非常重要！我之所以庆幸自己生在新中国，是因为几十年后我越来越看到，我在少年时代所接受的教育，会在此后的岁月中日益显出弥足珍贵。

二

我还该特别写下，正是新中国的教育，使我去插队时对农民不那么陌生，并且在农民给予我的许多帮助中，真正体会到人世间有些恩情无法报答，只能铭记。

记得我18岁那年得了恶性疟疾，

高烧不退，说着我自己不知道的胡话。我插队的村子只有14户人家，全村只有我一个知青。夏季的大水冲毁了小村连接大队部的桥梁，我们村成了孤岛。村里的妇女们轮流看护我，把老人们认为能退烧的草药熬成汤一口一口地喂给我……1976年冬，我告别生产队的乡亲，就要离开插队8年的闽北山村了，乡亲们把我送到村口，队长说：“你还会来看我们吗？”这句话有无限内容，令我震撼！那以后，我一次又一次重返插队的村庄，看到衰老的笑容是怎样把我视如归乡的儿子，牵衣执手争着拉我回家，我的泪水就像种子那样掉在我种过的土地。

多年后，我曾应邀给北大中文系的学生讲课，整节课我只讲了两个字：农民。我说，科学主理，文学主情，在我全部的作品中，最深厚的感情，是农民哺育的。我曾写下：“作为土地，我情愿被谁耕种；作为庄稼，我情愿被谁收割。”

并非只是感情。我是在离开乡村后才知道，泥泞的日子，不只是乡村才有。在都市遭遇的泥泞，比乡村更复杂更深不见底。这时刻，田间村姑的一句话就在我耳边响起：“别怕，把裤腿挽高一点。”可以说，我是在离开农村后，才更加理解了农民。

又过了很多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很复杂的变化，我庆幸自己没有丢弃从少年时代就认取的人生意义。它使我一生都没有羡慕富人的苦恼，没有在任何权力面前感到自卑，也懂得识别专家名流从而知尊敬或者不为所惑，能体会到高尚所给予我的感动，能与最普通的人们有一种天然的感情而容易有真朋友。这些都和我自己的

生命存在、生活感受休戚相关，这不是无关紧要的事，这至今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财富。就文学创作而言，这些就是我全部作品的基础，是我的立场，说白了就是我得以立足的土地，是我情感的归宿、心灵的故乡。

三

2000年，我写的《智慧风暴》出版。全书开篇写道：“市场陈列着希望，也埋伏着陷阱。你听到钱币在生长着钱币，那是一种神秘莫测的东西。计算机正在许多领域取代齿轮，互联网正使人类获得空前的资源共享……这个世界正在发生重大变迁。”

是的，我是用一部报告文学向全国报告，一个计算机取代齿轮的时代正在风暴般地改变世界。此时我国不仅有规模很大的亟待改造的传统工业，还有规模巨大的18世纪的手工业，属于智能型的高技术产业只有很小的规模，我们的困难是严峻的。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它，才能把重大转型变成重大机遇。

我在前言中写下：“人类历史上经历这种重大变迁的时期并不多。我没有机会在2000多年前去采访那场生生灭灭、威武壮烈的社会变迁，我也不能在200多年前去记述蒸汽机出现前后的欧洲巨变，但今天，我就站在中关村的土地上目睹了这场与世界前途密切联系的历史性变迁。我如果没有认识到也就罢了，认识到安敢不言？”

这部作品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有朋友赞扬说《智慧风暴》怎么写得这么开阔。我自己知道，我少年时所受的教育教导我们要关心国

家大事，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我一直没有忘记，它深深地融入了我成长的年轮，哺育着我灵魂的四季。基于同样的原因，我在2004年写出《新教育风暴》。

我写出：每当生产力发生重大性进步，引起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迁，教育就会发生重大转型。我由此强烈呼吁中国务必创建信息时代的新教育，指出这将是1300万教师率领着3亿学生从工业时代的教育向信息时代的新教育浩浩荡荡的伟大迁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部报告文学尚未出版时就拿着清样开始全书连播，中央电视台随后拍摄出30集电视报告文学片。这部书再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并获鲁迅文学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高度重视建立文化自信，并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我认真学习体会，从内心里认识到建立文化自信确实至关重要。

2013年我写出《人民观》。这本书上起《尚书》，下至当代，在4000年殷殷相继的文化传承中将中国历史文明和现实政治融为一体。2016年，我在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长征》中担任电视总撰稿。这些创作都使我自己深受教育，体会到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



□ 顾伯冲

从东清铁路到『一带一路』

满洲里是一座因铁路而生、因铁路而兴的城市。

今年盛夏的一个下午，对于长期生活在北京干燥气候里的我们，刚到满洲里就让一股沁人心脾的清凉使自己浑身舒爽了许多。有人形容这里的空气可以“洗肺”，可我面对横卧在这广袤大地上两根绵长的铁轨时感受到了另一种气息，它可以“滤心”。

这个“一眼望俄蒙、鸡鸣闻三国”之地原名不叫满洲里，而是称霍勒金布拉格，蒙语意思是“旺盛的泉水”。100多年前，这里是清政府边防的卡伦哨所所在地，在大清国的版图上连个针眼也没有。

光绪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896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段惶惶不安的动乱年月，霍勒金布拉格不知怎的，运交华盖，成为了前去俄国参加沙皇加冕典礼的清政府特使李鸿章与沙俄密谈的一个中心议题，就是允许俄国修筑从赤塔经过这里连接沙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铁路，简称“东清铁路”，并且写进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当时，为了掩人耳目，没有公开，成为《中俄密约》，其实这里面掩埋着让人大吃一惊的史实。

东清铁路从1897年8月举行开工仪式，次年正式破土动工，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西、南部三线，由六处同时开始相向施工。1903年7月14日，东清铁路全线通车营业，最终形成“J”字形的形状。当时，俄国人将西伯利亚铁路盖达洛夫斯卡亚进入中国的首站定名“满洲里”，从此一个新的地名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而古老的地名“霍勒金布拉格”消失了。

1904年到1905年间，日本与沙俄为了争夺朝鲜半岛和中国辽东半岛的控制权，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大打出手，而中国人只有看的份儿，很多往



事许多年后仍然缭绕在这座城上，变成了世代相传的故事，进入了人们的记忆和血液。最终，战争以沙俄的失败而告终，双方随即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规定长春以南路段改属日本，称为南满铁路，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华的重要工具。

此后，这条铁路又改称为“中国东省铁路”，简称中东铁路或中东路。1945年，苏联一度又拥有这条铁路。1952年，东清铁路回到中国的怀抱。时间筛过轻松，滤过平凡。白杨树不管寒往暑来，风吹雨打，还是一圈一圈地画着自己的年轮。青山依旧，河流依旧，沧桑几度，人事全非。

我站在空旷、寂寥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试图探寻年轮的轨迹，纵览过往的沧桑，聆听那久违了的马头琴声。随风潜入耳轮的忽远忽近的阵阵马蹄，似鼓点打着远年的画面——那不绝于耳的风号是当年争夺疆域的厮杀声吗？那黑魆魆的地平线是蒙古族人遗忘在天籁的家史吗？

在这片土地上，让我真正感受到了“‘战争’两字很悲壮，‘胜利’两字很沉重”这句话的分量，也使我的内心愈加复杂了起来。

作为殖民主义的产物，“东清铁路”就像插入祖国母亲身上的两把钢刀，触及我们民族的深层心理，一直让我们感到羞辱不已；同时，这个曾经荒寂的东北边疆小哨卡，随着“东清铁路”的建设和开通，客观上带来了先进的文明和理念，使最早只有几户蒙古族牧民的地方有了新的发展空间与机遇，使它像挣脱了血族脐带的人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与美。

正是因为有了这条铁路，这里曾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红色秘密交通线的重要站点，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联系的“红色交通站”所在地。1928年六七月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来自中国各地的140多名中共六大代表中，有100多名都是从满洲里前往苏联的。前些年，当时护送六大代表的一名老交通员还

健在，逢人便讲起那些渗透着红色而又神秘的故事。

现在看着那些熟悉的文字与照片，关乎爱与恨、喜与悲、生与死、豪情与希望的深刻启示，影响了我们几代人的价值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集体的记忆是最深刻的历史。

以2013年金秋为起点，“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承载时代使命的世纪工程，掀开了这条带着历史痕迹的铁路发展进程的新一页。

草原为底，铁路为带。看着一趟接一趟的班列从巍峨庄严的国门经过时，我们的自豪之情油然而生。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们，自从2013年9月首列中欧班列（“苏满欧”）经满洲里口岸成功开行，相比海上运输的40多天，铁路运输只需要13天到15天，物流时间缩减了70%，各种效益集中凸显。随后大连、沈阳、长沙等城市也陆续开通经满洲里去往欧洲的集装箱班列。满洲里铁路口岸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和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

我们民族极其宝贵的财富。

在拍摄《长征》期间，一个偶然的机缘让我看到，贵州省的塘约村在遭遇一场大洪水后，党支部在组织村民救灾中组建了“村社一体”的合作社，重走发展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道路。我的心突然就留在了这个村。我再一次遇到了“不敢不写”，我写了《塘约道路》。

我没想到书出版后影响不小。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的俞正声读后赞扬塘约是“新时期的大寨”，贵州省委号召全省农村学“塘约经验”，全国各地还有不少领导同志向党员、干部推荐《塘约道路》。中央各大媒体都报道了塘约的可贵实践。全国数十万县乡村干部阅读，读者中最多的是村党支部书记。那时我一次次想起了我插队村庄的老支书，想起村里许多帮助过我的农民朋友，我知道《塘约道路》里有他们的汗水，他们的温度。习近平总书记记说的：“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这是我应该永远记取的。

后来我写出《中国天眼：南仁东传》，这部书是中宣部2018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2019年入选“新中国70年百种译介中国好书”。本书已改编拍摄成电视连续剧《中国天眼》，列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剧目，我是总编剧。在创作中最难忘的情节是，南仁东大学毕业后到工厂与工人相结合10年，日后在贵州大山选址与农民共跋涉又10多年……我看到了这是个满身都是工农气息的中国式科学家。在南仁东的奋斗历程中，最可贵的就是在祖国最需要的岁月，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找回来，才得以建成中国自主研发的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射电望远镜，挺进到世界天文学领域的前沿。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中国天眼》的片尾用了这支歌。我非常喜爱这支歌。回想我自己走过的路，步步都离不开祖国的养育。歌声里的袅袅炊烟和村落，总能让我想起，我从哪里来，该到哪里去。



亚欧国际联运的“新通道”。而“中欧班列”通过铁路实现了中欧两大市场的快速联通和互动，增进了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

塞北最美是夏天，草叶沁出漫天碧绿，花枝擎起含苞蓓蕾，金灿灿的油菜花一望无际，满眼苍翠，林带如织。抓一把清新的空气，里面有声、有味、有色。

满洲里，高楼大厦星罗棋布，夜晚的热闹就像梦中的月光，洒满祥和的气息，五颜六色的轿车来回穿梭，白皮肤、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商客、游人随处可见。清凌慢慢悠悠，像草原人悠闲散淡的性格，更像一幅烟雨朦胧的油画。它正将欧亚陆路大通道上的重要枢纽和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支点的作用日益彰显。

从东清铁路到“一带一路”，不仅是时代的变迁，而且是一次思想的升华，是一条通道的拓宽，是一个方向的确立。如果一个民族在历史的灾难中获得一种自觉反省和深刻批判的能力，那那种悲剧便获得超越其本身历史范畴的永恒的警示价值。

内蒙古辽阔的大草原，堪为中国坚挺的脊梁，中国宽厚的胸膛。

思想写于蓝天，精神泼向苍茫。苍穹之下，大野之上，清流之畔。几千年人类文明史告诉我们，人类前行的历史就是一部文化史、文明史。事物相克相生，此消彼长，自有内在规律，不一定非要刀光剑影。其实，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其最终意义不是军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

